



德国社会民主党执政的教训

斯特凡·波罗斯特

2006-9-13 11:05:06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赫尔穆特·斯密特内阁（1974-1982）和格哈德·斯罗德（1998-2005）内阁，因各自独特而又同样失败的经济政策而联系在一起。

斯密特的经济政策奉行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古典理论。在1975-1976年和1978-1980年，斯密特政府通过实施政府投资规划走上刺激需求的道路，资金来源通过政府借贷，同时降低工资成本。包括供给因素和需求因素在内的混合政策在1975年大获成功。但面对国际性的经济增长缓慢，1977年德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又滑落到3%，失业人口超过100万。1978-1980年，斯密特政府推行类似于1975年的新的中央投资计划，规模更大，时间更长。但1978-1980年再度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使得这些成就付之东流。政府陷入德国出口工业集团的巨大压力之中，放弃了中央投资计划，一道被放弃的还有作为政府工具的凯恩斯危机政策。

弗里茨·沙尔普夫的《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危机政治》为斯密特失败后的社民党的“现代化派”提供了理论基础。沙尔普夫要求社会民主主义提出“旨在增加雇主利润的社会民主主义的供给经济学”，这种社会民主主义的供给经济学一定总是有助于提高资本家阶级而不是工人阶级的收入水平。

在20世纪80和90年代，整个一代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左翼和右翼都遵循着沙尔普夫指出的道路前进。斯罗德及其政府在2003年曾希望他的再分配政策带来高投资和高就业。但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在2004-2005年降至1.3%，失业数不降反而再次升高。凯恩斯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供给经济学（不如说是斯密特和斯罗德的社会民主党新自由主义）的双重失败，在一定意义上成为社会民主主义垮台背后的真正原因。

“劳动和社会公正”党的出现是工会团体对新自由主义危机作出的反应。“劳动和社会公正”党要求维护福利国家的成就，要求政党的集体一致，要求实行最低工资制和普遍提高群众的购买力，所有这些不仅是正确的，而且从工薪阶层的角度看也是完全合理的。然而，“劳动和社会公正”党也认识到老式的凯恩斯主义的危机。它的竞选宣言中没有回到凯恩斯，它的未来投资规划中关于福利国家的保障和反对失业的斗争，是通过增加中产阶级（通过政府保险基金）和富人（通过增税）的金融负担而不是通过政府借贷来进行融资的。

但是，在资本主义体系之内，左派政治不能在长时期内以此为基础。自上而下指导再分配并通过向富人增税来执行国家的需求计划的政府，很快就会面临整个雇主阶级的激烈反对，更不用说德国传统上出口作为国内繁荣的发动机占有主导地位。

要补充的是，当竞争是全球化的资本主义体系内的国际竞争，而且并非所有竞争者都受政府政策的影响时，情况就更是如此。面对这种情况，拉封丹和其他的左翼凯恩斯主义者提出应建立国家“社会标准”。不过，只要有某种经济实行较低的工资和较长的工作时间，从而具有国际竞争的优势，这些标准就不会存在。

当我们面对着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显然长期萧条的趋势的时候，左翼党在这个时期加入政府会很快使自己与其选民和支持者的利益发生冲突。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危机并不是这种或那种错误的政府政策的结果，而是源于这一事实：每届政府的政策必然为资本主义服务。在当前的经济条件下，为维护甚或扩大福利国家的每一场严重斗争都将导致与统治阶级的激烈冲突。不再有可能返回到“社会伙伴关系”了。

（摘自《社会科学报》2006年2月9日 侯树栋译）

转载务经授权并请刊出本网站名

(浏览本网主页，建议将电脑显示屏的分辨率调为1024*768)